

N 本期聚焦

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王立胜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

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建构的主体性问题

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为讨论成功的原因。

我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确实创造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做出科学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为市场经济的根基，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

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

严格说来，政治经济学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

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逻辑，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建构也就有了基础。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是“道”，第二是“法”，第三是“术”，第四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研究的“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指导，“术”和“技”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有删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来源：光明日报

N 学有所思

如何理解“租购同权”带来的影响

李筱乐

近来，有关“租购同权”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公众主要关注两个内容：一是“租购同权”对房价的影响；二是对保障承租人子女享有公共教育服务权益的影响。

应当看到，我国的住房存在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分析房价问题时，需要兼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两种属性的转换因素。第一，在短期无法大规模增加住房土地供给时，增加住房租赁市场上的供给是一个缓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但这不是意味着，只要提高房子的供给数量，就可以缓解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失衡？答案显然没那么简单。居住需求不仅包括居住空间上的需求，还包括对居住区质量的需求，如优质的教育。所以，在短期无法大规模提升住房土地供给之时，“租购同权”可以促使更多房源释放到租赁市场，并扩大公共服务的空间范围，有利于缓解人口和土地矛盾造成的房价上行压力。

第二，不能片面地说“租购同权”增加了租购套利机会。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上存在三种套利情况：空间套利、金融套利、租购套利。空间套利通过更换居住地房产来扩大收益；金融套利通过投资房产实现高于其他投资品（如股票、债券）的收益；租购套利通过买房和租房之间的转换获取收益。以学区房为例，优质的教育服务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容易形成空间上的垄断，给空间套利提供机会。

“租购同权”无疑可以降低这种垄断的程度，有利于遏制一部分空间套利行为。但是，租房者权益的增加可能引发租购套利、房屋“惜售”，导致房价上涨。但要看到的是，这三种套利机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空间套利机会减少带来的影响较大，则房价

就会下降。

现实中，对“租购同权”问题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一是“租售同权”前置门槛高，突破排位入学阻力大；二是资本更青睐优质学区房，难免会引发房价上涨；三是现有房源远远不能满足住房租赁市场发展需求，增加房源是需破解的难题。因此，不能过高看待“租购同权”，更不能寄希望于一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下一步，相关改革及配套政策需要循序渐进。

优质学区房和普通学区房地区不能采用一刀切式政策。对优质学区房地区的“同权”改革阻力势必不小，短期可适当降低前置门槛，长期来看还是应该从改善教育资源配置入手，补短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普通学区房地区，不妨放宽“同权”的前置条件，彻底改变排位入学的机制。

降低住房市场中套利的预期。主要通过降低刚需预期和提升房产保有成本预期来影响房价。按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满足不同层次的租房消费需求，发展廉租房、保障房和市场化租房等多层次住房租赁市场，鼓励更多的刚需进入房屋租赁市场。通过财税政策调节住房保有量，降低房价和租金对其实际水平的偏离程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调节机制。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增加有效房源。加强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明确住房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租房租赁制度，通过立法保障租房者的权益，提升租赁关系的稳定性。挖掘现有房源，扩大有效房源，增加“只租不售”供地，鼓励房地产企业参与长租公寓领域。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来源：解放日报

N 学者观察

储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姚洋

怎样认识我国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与高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我国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是高储蓄率造成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杠杆率是一个大问题，也蕴含着较大的风险，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借到那么多资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流动性太充足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政府需要做的，就不是紧缩流动性，而是促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加有效地使用资金。

就整体经济的高杠杆率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依靠经济增长稀释货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投资进而提高资产的收益率，以更多的实物资产来对冲货币增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靠高速增长来稀释货币作用有限，而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很快，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投资回报率还要

下滑，发达国家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在4%到5%之间，我国基本上也要回归到这个水平。要永久性降低流动性，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用好储蓄，使之不再产生过多的流动性；二是增加消费，尽量少产生储蓄。具体到操作层面，不外乎三个措施：增加对外投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加居民消费。前两个措施瞄准用好现有储蓄，第三个措施是降低储蓄总量。

能否把降低杠杆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直接融资上面？直接融资不经过商业银行，因而不会放大货币规模。我国的直接融资规模还非常小，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30%左右，其他70%则是通过银行完成的。美国的情况刚好反过来，70%的融资是通过直接融资手段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和美国的整体债务规模是不可比的。扩大直接融资不仅可以减缓货币增长的速度，而且有利于创新，让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得到融资。

另外，直接融资还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让他们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然而，发展直接融资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需要强化制度和法治建设，我国在这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把降低杠杆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直接融资上面。

增加消费可以降低储蓄吗？增加消费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储蓄，因而可以起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但是，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一直不低，每年都在7%-9%之间，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面临较大的难度。剩下的只有依靠政府提高消费比例。一方面，政府应该大大降低投资规模，把投资让给民间去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国债的发行。由此节省和筹措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民生，这不仅直接增加消费，而且可以引导居民增加消费。我国一些政策导向往往重生产、轻福利；就社会而言，“勤劳致富”也早已上升到伦

理的层面，成为持家立业的座右铭。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小康，因而应该更加注重福利的改善。

政府多发一些国债，实质上是向未来预借消费。按照宏观债务比例来看，我国的负债率是很高的，但是其中主要是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很高，政府负债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仍然有提高的空间。的确，地方政府已经背负巨额商业性债务，但是，这些债务基本上都花到经济建设上去了，而不是用来直接改善民生。如果政府把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花到改善民生上面，增加国债发行就可以减少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因而就不会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总体负债规模。因此，政府多发国债也相当于政府改变资金筹措方式和用途。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N 有此一说

吃饭付钱顺序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王兴康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因为太过熟悉，往往熟视无睹。比如去肯德基就餐是先付钱再吃饭，去高档饭店就餐是先点菜吃饭再结账。为何有这种差异？背后存在具体的原因吗？

的确存在具体的经济原因。一般来说，能够带来较大价值的物品，人们才会费时费力去考核。比如对钻石，人们会花费时间精力去考察它的重量、色泽、切工与瑕疵等，而对于一块普通的石头，人们只会衡量它的重量。又比如一家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贡献较大，他们的报酬可采用年薪加奖金、分红、休假、股权、期权等较复杂的方式，一般员工对企业贡

献相对较小，报酬往往采用相对简单的时间工资或者计件工资，最多再加点奖金。

同样的道理，高档餐馆的食品往往比较昂贵，顾客才可能费时费力去考察食物的质量与口味，而快餐的价值往往较低，顾客不太可能费时费力去考察食品的质量。这是高档餐厅先吃饭后付钱，一般快餐店先付钱后吃饭的原因之一。

既然客户很少考核快餐店食品的质量，那么，往往由卖方保证食品质量。卖方或者建立品牌，或者采用连锁店的形式，比如肯德基之类，以此提供抵押，如一家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贡献较大，他们的报酬可采用年薪加奖金、分红、休假、股权、期权等较复杂的方式，一般员工对企业贡

档餐厅的食品，可以考察原料，也可以考察成品，可以在就餐前考察，也可以在就餐时考察。饮食的特点决定了顾客在饮食时考察最容易、最方便，因此，在高档饭店就餐往往是先点菜、饮食，对食物质量没有意见再付钱。这也是高档餐厅先用餐后付钱的原因。

其实，在交换与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人们会千方百计地降低合约费用，无论在交换还是生产领域均是如此。以交换方式为例，人们可以用物物交换，也可以用物品与货币交换。在原始社会，物品有限，交换规模较小，人们多采用物物交换。随着生产力提高，物品丰富，交换规模扩大，人们先用贵金属，后用纸币，现在用电子货币交

换。价格是单位商品质量的标准，一般来说，商品质量高价格高，商品质量低价格低。对于容易识别质量的商品比如农产品，人们往往通过市场交换。此时，商品价格一方面引导资源使用，另一方面决定收入分配。

吃饭付钱顺序的背后，是商品交换的原理。商品交换需要付出衡量与监管等费用，各色各样的交换方式与交换条款服从趋向总的交易费用较低的原则。降低交易费用，扩大交换规模，细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丰富财富，提高福利，这便是吃饭付钱顺序背后的具体原因。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来源：深圳特区报

观点集粹

大数据时代如何加强市场监管

迟福林在《经济日报》刊文指出：近年来，市场主体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全社会信息量爆炸式激增，数量巨大的数据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我们在全面推广大数据监管的基础上，既做好企业信息监测，又做好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精准的信息化监管模式。一方面，要加强企业信用信息监测，强化数据运用。根据市场主体、商品质量、消费投诉、商品价格等企业信息数据，建立科学的数据分析模型，通过数据比

对、分析和筛查，及时发现涉嫌违法的市场主体，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另一方面，要实施精细化监管，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实施数字化监管，监管执法人员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技术，全面实施数字化监管，实现向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管理的转变。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在监管部门数据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建立监管部门联合打击失信企业行为的机制，鼓励工商、质检、食药监等部门合作联合打击企业失信行为。

营造宽容环境让创新成为新常态

梅松在《深圳特区报》刊文指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种新的更加环保、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替代现在的汽车，那时，汽车行业会不会像曾经的马车行业一样，成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阻力呢？我们不会缺乏迅猛发展的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如何营造让新技术

战胜旧观念的制度环境，如何形成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政府部门，面对新事物，不能习惯性地用老套路来治理新问题，否则很可能将那些潜在的社会进步扼杀在摇篮中。管理部门应该有广阔的视野与前瞻性的思路，营造宽容的创新环境，让创新成为新常态，让创新成为新潮流。

辩证看待“微信圈子文化”

曾一果在《北京日报》刊文指出：对于微信所建立的“圈子文化”，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微信确实让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交体验，让每个人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开展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以微信为平台所建立的“圈子文化”，也可能复制和强化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种类繁多的朋友圈、微信群或公众号都存在于一个更

大的文化和社会场域中，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结构产生着关联，构成了一种比现实社会更为复杂的关系。以微信、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介，不仅从信息的传播模式、个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全面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也建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状况，这需要我们去做更具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